

唐师曾：“活一天，就要做一天新闻”

知名战地记者唐师曾于2026年8月23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65岁。

唐师曾是新华社摄影记者，同行习惯叫他“唐老鸭”。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，他辗转交战双方采访，是最后撤离巴格达的中国记者之一，也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公开采访的中国记者。此后，他采访过阿拉法特、拉宾、佩雷斯、曼德拉、穆巴拉克、卡扎菲等众多国际人物。



从大学讲台到新闻现场

唐师曾1961年出生于北京，祖籍江苏无锡，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。

在北大读书时，他经常经过未名湖畔的埃德加·斯诺墓。多年以后他回忆，那时候自己每次路过，都会献上一花一草。他崇拜斯诺，也崇拜约翰·里德和罗伯特·卡帕。特别是卡帕那句著名的话——如果照片拍得不够好，是因为离得不够近。这几乎成为唐师曾理解摄影记者这个职业的一把钥匙。

大学毕业后，唐师曾曾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，但他还是想当记者。1986年，他在同事帮助下找到了著名记者、作家萧乾的住址，登门拜访。此后他又接连报考多家媒体，最终进入新华社。唐师曾自己说，是时任新华社社长穆青“破格引进”了他。

刚进新华社时，他跑的是北京新闻，也被同行取了个“唐老鸭”的绰号。他曾解释自己为什么叫“唐老鸭”：年轻时候跑突发新闻，采访现场总是乱哄哄的，镜头被人挡住，他就急得冲着别人叫，非要挤出一条拍摄通道不可。时间久了，同行便给他起了这个外号。

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，连移动通信都是稀罕物。为了比别人更早知道哪里出了新闻，唐师曾很早就买了BP机。他还特意要了一个好记的号码“5566”。理由很简单：报纸上经常能看到自己拍的照片，别人得能随时找到他。

1987年，他又开始使用当时十分少见的移动电话。机器很大，说话时要按住按键，听的时候再松开。他把这些装备看成记者的一部分——要第一个知道消息、第一个赶到现场、第一个把新闻传出去。那几年，他甚至总结出一套自己的“闪击式”跑新闻方法。

当战地记者常常“挨炸”

真正改变他记者生涯是在1990年夏天。那年8月2日，唐师曾正在可可西里参加科考。在海拔很高的荒原上，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消息。他的第一反应是“我也要去现场”。

1990年底，他前往巴格达。联合国要求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前从科威特撤军，随着最后期限临近，战争一触即发。就在这一阶段，时任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·德奎利亚尔突然抵达巴格达，与伊拉克方面进行最后的外交

斡旋。唐师曾后来回忆，这是自己当年在巴格达抢到的一个重要现场。德奎利亚尔来去匆匆，他在机场举行简短的新闻发布会，唐师曾赶到现场拍下了这一幕。

战争最终爆发。由于安全等原因，唐师曾撤离伊拉克，成为最后撤离巴格达的中国记者之一。不过，他没有就此回国，而是转往战争的另一侧——以色列。那时中以尚未正式建交，他由此成为第一个在以色列公开采访的中国记者，并使用以色列电头向国内发稿。

在以色列，战争从新闻变成了每天都可能发生在身边的现实。伊拉克不断向以色列发射“飞毛腿”导弹，以色列则部署“爱国者”导弹进行拦截。唐师曾后来回忆，那段时间自己就在特拉维夫“挨炸”。

唐师曾并不回避自己在战场上的恐惧。2003年，有网友问他采访时是否害怕流弹，他回答得很干脆：“害怕。”他还说，自己是新华社摄影部第一个购买钢盔的人。

生病后没放下手中的笔

战争留给唐师曾的，不只是照片和故事，也包括一副逐渐不再允许他“横冲直撞”的

身体。1997年，36岁的唐师曾病倒了，患上“再生障碍性贫血”。他多次住院，做过4次骨穿手术。

病得最重的那几年，他没有完全停下写作。1998年，唐师曾在病床上完成《我钻进了金字塔》。到了2000年，海湾战争爆发10周年，他又惦记起了伊拉克。当时身体仍未恢复，单位让他在家里休养，他却决定以私人身份，自费重返巴格达。光明网后来刊载的《重返巴格达》书稿，将当时的他形容为“拖着病重的身躯”再次前往伊拉克。

2004年，仍未康复的他参加了法国“诺曼底登陆60周年”纪念活动，重新走访二战旧战场。

有人曾问他，为了采访摔伤腿，后来又患上血液病，“几乎搭上了命”，究竟亏不亏？唐师曾回答：“不后悔，我认为值。”他说，人的生命一闪而过，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，又亲历那么多大事件，是自己的幸运。“我是为新闻而生的，为此永远朝着自己心中的目标努力，中国话叫‘狐死首丘’。活一天，就要做一天新闻。”

（综合《新华日报》、中国新闻网 范杰逊等/文）

邹韬奋的骨气

1926年10月，《生活》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，《生活》周刊改由邹韬奋担负编辑责任。

《生活》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，就敢于同黑恶势力作斗争，“风行海内外，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”。

他曾经说“没有骨气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”，要具有“刀锯鼎镬非所敢避”的决心，“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”。

1931年，《生活》周刊披露了交通部长兼上海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的重大贪污行为，王伯群企图以10万元巨款收买邹韬奋，遭到断然拒绝。

他在《生活》周刊的《信箱》栏目发表言论说：“在做贼心虚

而自己丧尽人格者，诚有以为只须出几个臭钱，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，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，但是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。”振聋发聩，掷地有声。

1936年，邹韬奋在香港办《生活日报》时，广东军阀陈济棠特地派副官接他到广州谈话，送他30000元，他婉言谢绝，洁身自好，不受嗟来之食。

蒋介石想收买邹韬奋，曾专门叫杜月笙陪邹韬奋去南京见他。但邹韬奋坚决拒绝了，决不与蒋介石同流合污，宁愿选择逃亡海外。

这便是浩然正气，便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。

（摘自《文史博览》崔鹤同/文）

1943年前后，杨绛创作的剧本《称心如意》《弄假成真》相继在上海公演，一时盛况空前。

看到妻子在戏剧界备受赞誉，钱锺书深受触动。有一天，二人在剧院看完《弄假成真》后，钱锺书突然说：“我也想写一部长篇小说！”杨绛听后非常支持他。

为了让丈夫安心写作，杨绛挑起家务重担。在杨绛的大力支持下，钱锺书全身心地投入创作。他以亲身经历为蓝本，融合了自己在西南联大的经历、留学背景以及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，开始动笔写小说《围城》。创作期间，杨绛是“第一个读

杨绛督促丈夫写《围城》

者”。钱锺书每天都把写好的定稿拿给杨绛看，急切地瞧着她的反应。两人常因书中的幽默情节相对大笑。

经过两年不懈的努力，钱锺书创作的《围城》终于告成。“弄翰捻脂咏玉台，表编粉指更勤开。偏生怪我耽书癖，忘却身为女秀才。”钱锺书对杨绛心怀愧疚，用诗句表达对妻子日常忙碌家务的疼惜，并在《围城》序言中明确写道：“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，替我挡了许多事，省出时间来，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。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。”

（摘自《人民政协报》王剑/文）